

# 兩個世界之間

李義男

書名·Between Two Worlds

作者·John Hohenberg

出版·Frederick A. Praeger, Inc, Publishers: New Work 1967

## 作者簡介·

賀恩柏 (John Hohenberg) ，一九五〇年起任哥倫比亞大學新聞學教授，一九五四年來任普立茲獎顧問董事會祕書，他是位國內外實際新聞工作者 (working newspaperman) 曾在外工作達廿五年，一九六三年當他哥大定期休假 (sabbatical leave) 期間，曾以美國國務院專家的身分在遠東及東南亞的卅五個城市發表二百五十次演說，一九六四——六五年，他是一位美國對外關係委員會的研究員，在這期間他研究亞洲各國及美國之間新聞的流通性 (flow) ，本書「兩個世界之間」 (Between Two Worlds) 即此一研究之報告也。此外，賀恩柏尚有其他重要之著作，舉其要者如：

- 1) The Professional Journalist
- 2) Foreign Correspondence
- 3) The New Front Page
- 4) News Media

## 本書簡介·

本書內容主要記述美國及亞洲國家之間政策、報業及輿論之關係。賀恩柏在他一萬兩千里在亞洲七個國家旅行期間，他常常聽到亞洲國家的政府官員、報紙編輯、發行人、大學校長、學生、教授、美國外交官及美國新聞處人員、國外記者以及很多亞洲國家及人民說這麼一句話：「我們得到很少關於美國的消息，美國亦得到很少關於我們的消息，我們如何希望彼此有著更好的了解呢？」儘管美國與亞洲國家經由無線電、國外記者、電視等媒介的廣泛報導，消息的罅隙（information gap）仍是存在著，表現出亞洲國家與美國關係很明顯的消極因素之一。

雖然一般明白報紙在形成一個國家外交政策的重要性，可是至今，在這個重要的地區仍不很受重視。本書即賀恩柏在一九六三及一九六四年旅行亞洲國家期間訪謁數百名政府決策者、名記者，以及讀這些報導的亞洲人及美國人所寫下的。他說：「在亞洲，除了新聞事業的技術外，新聞的交換，（包括意見與觀念）是一種政治行爲（political act），結果，在獨立之新聞媒介及直接或間接之政府控制中，有著永無休止的爭鬥（unending struggle）。」在火箭能在數分鐘內攜帶原子，毀滅數百萬人民的時代裏，獨立報業與政府控制報業之間，爭鬥的因素及其重要性成爲本書的主題。「Between Two Worlds」這本書揭發了報業與政府與日俱增的關係，指出二者皆有發展一較大責任感的需要。報業所主張公眾知之權利之範圍與國家安全之需要常相對立。政府亦利用報紙發展公眾對其既定之政策的支持。賀恩柏認爲國外通訊與外交政策的關係是很重要的。這不僅是在越南和在東南亞之其他地方是如此，即在美國與全世界亦復如是。他探討自二次大戰來在亞洲之美國國外通訊之發展、闡述報人的寶貴經驗及其對政府政策之影響性，他也注意了一些有關新聞處理的控告，有些是真的，有些是誇大的。尤其在 Kennedy

and Johnson 時期爲然，他並描述越南戰爭中報業的任務，他指出記者所遭遇的困難以及他們所造出來的困難。本書作者指出受過訓練之新聞記者敏銳之理解力及具學者之識力，至爲重要，未來新聞記者必須盡其所能來傳導美國及亞洲國家之間的瞭解，這是一位新聞記者所面臨最大挑戰之課題。

再者，亞洲及美國人民背景不同、文化不同、外表不同、語言不同、歷史、哲學、生活習慣不同，所以真正之了解，甚難達成。中共之好戰造成一種不穩之國際關係。他在本書討論各國人民間之罅隙，他寫本書有一個假定即在公開的社會中，國外記者、編輯、新聞媒介對一國外交政策的形成，具有其影響力，經過一番研究分析，這一假定在今天是相當正確的。

事實上，在亞洲東部、南部及東南亞糾纏之事務中，新聞事業與外交之交互作用 (interaction) 比其他地方更爲顯著。其中最重要者莫過於美國之參與越南之戰爭。在日本及印度，報紙對政府之影響，非常明顯，毋庸置疑。可是很多政府官員或大使館對新聞記者仍存戒心，或有不予合作之現象。他們認爲新聞記者就好像是管樂隊在中國葬禮中所扮演的角色一般。外交人員深感記者是需要的，但卻又認爲他們如同隨人號啕的哀號者。政治家、外交家被赫壞了。他們不喜歡那吵雜的聲音，但又不能沒有他們。

報紙對外交事務的影響在本世紀更爲明顯，就以美國而言，今天美國的國外記者比二十年前任何時候爲多。新聞、雜誌及電視的興起強化了大眾媒介的力量、報紙的作用在太平洋、大西洋兩岸都可能影響未來之民主體制。

## 越戰之報導記者

一位有經驗之記者自西貢說：「一位自美國到此地來工作的記者，他對西貢之新聞採集，傳遞必會感到驚奇。」

越是思考周到的美國編輯以及一些出版者到越南去看過一場號稱爲新型態之戰爭（New Kind of War），不論他們是鷹派、鴿派，沒有一個人不被戰場的經驗所深爲感受，沒有一個會對報紙所刊載的表示漠不關心。

採訪越戰之消息必須有特殊之技巧，何是大部分的都認爲他們的表現並未恰當，在越南採訪新聞最久的兩位，一位是 New Yorker 的 Robert Shaplen，另一位是 Newsweek 的 Francois Sully，兩位都曾在東南亞斷斷續續達二十年之久。Sully 是位法國籍的記者，他對美國的官場具有信心，但他不會保留他所見所聞。

關於美國在西貢之國外記者，據作者所述，謹列舉如下：

Name	(Age) Nationality	Organization	Education	Language (in addition to English)	Years of Newspaper Experience
Charles P. Arnot	(47)	U. S. A. B. C.	Attend college	German, Arabic	29
Beverly Deepe	(29)	U. S. New York Herald Tribune	Nebraska, A. B. Columbia, M. S.	French, Vietnamese	6
Stan Karnow	(39)	U. S. Saturday Evening Post	Harvard A. B.	French	14
Ray Herndon	(27)	U. S. U. P. I.	Nieman Fellow	French	2
Mike Malloy	(28)	U. S. UPI (chief)	Attend college	French	9
John Sharkey	(34)	U. S. N. B. C.	Holy Cross, A. B.	French	6
Jerry Rose	(30)	U. S. Saturday Evening Post	Johns Hopkins, A. B.; Iowa, M. A.	French	3
Arbikd Beichman	(51)	U. S. New York Herald Tribune	Columbia, A. B.	French	
Peter Grose	(29)	U. S. New York Times	Yale, A. B.; Oxford, M. A.	French German	5
David Horowitz	(27)	U. S. N. B. C.	Bradley, A. B. Northwestern, M.A.	Spanish	9
Peter Arnett	(29)	N. Z. AP		French	12
Malcolm Browne	(33)	U. S. AP (chief)	Attend college	(Vietnamese)	8
Francois Sully	(37)	French Newsweek (chief)	Nieman Fellow	French, Vietnamese	11
Robert Shaplen	(47)	U. S. New Yorker	Wisconsin, A. B.; Columbia, M. S. Neiman Fellow	French, German	30
Garrick Utley	(24)	U. S. N. B. C.	Carleton, A. B.	German, Ruwian	1

從以上十五名美國新聞機構在西貢之情形看，大部分是年輕的記者，其中十三位是美國籍、一位法國人、一位紐西蘭人。十位大學畢業，六位得有碩士學位，包括一位普立茲得獎人，三位Nienrau Fellows and C. B. S Fellow。

在越南採訪之各國記者到一九六六年達五百左右，曾有十位記者死亡，三十幾位受傷。美國在越南之記者最多，有一百二十六人。

英國及日本在越南都有很大的記者團，其他主要之歐洲的國家及亞洲亦有之。

目前，越戰之報導不虞匱乏，不論在電視節目、報紙或雜誌之篇幅皆甚多。以往韓戰期間及越南最先衝突之階段的報導不足，已不多見，如果電視有其缺點，但它激起公眾對戰爭之興趣乃其一大勝利。

雖然記者團之不斷受抱怨，但無人敢說他們是在逃避責任。他們有些每天都在戰鬥之中，有些積極地在尋找煩惱所在。他們的工作日有所進，雖然很多是年輕而無經驗的，但他們卻表現得非常盡責、勇敢、冒險與刻苦的精神。

紐約時報的一位記者赫勃斯坦，一九六一年起曾在越南採訪。他被指責歪曲新聞及弄糟新聞，被甘迺迪總統所特別矚目。當紐約時報的一位新發行人 Arthur Ochs Sulzberger 有次禮貌上拜訪白宮，總統問他是否有意調動赫勃斯坦。總統說：這位記者「過分參與，連累了越戰」(too involved)，可是這位報紙發行人很禮貌的回答說：「時報對赫勃斯坦的工作，非常滿意。」儘管如此，赫勃斯坦在幾週之內被調回美國，後來又任命他到波蘭去，之後，又因為他的報導使波蘭政府不悅，後來他又到巴黎去了。

駐外記者並沒有為美國在東南亞之政策創造問題，但是他們確使已存的問題加以擴大，當他們被指責給予敵人幫助時，基於正確的報導，國外記者是沒有錯誤的。

美國國務院曾試驗派遣一些政府官員到越南作一種新聞簡報（Press briefings）（記者會）的工作，但有諸多困難，人員及經費均非國務院所能供給。

### 紐約時報的影響

一九六四年的夏天，西貢的大部分記者公開猜測美國將協助轟炸德契明（Tchepone）地方，但到當年十二月十一日，曾任紐約時報軍事編輯二十年之久的巴第溫（Hanson Baldwin）將同樣之報導刊登於紐約時報。為一欄之完全報導並附有可怕性之箭頭指向Tchepone。

平實說，巴第溫的話亦非憑空而談，緊跟著詹森總統十一月之競選，泰勒大使回華盛頓，討論擴大美國參與越戰的事情，包括空中轟炸共黨補給陣地。

在短期之內，一位高級政府官員向時報抗議，說是巴第溫揭發了一項軍事目標，使得美軍在西貢不得不改變其目標及策略。然而美國參與 Tchepone 轟炸之計劃已經有多人猜測而知。主要地，其不同點為記者在西貢之閒聊可以忽略，但巴第溫在時報之報導則不能忽略。雖然所謂胡志明小徑之全盤網狀工作最後是被轟炸了，但是在寮國之攻擊被隱蔽著，因為美國正從事於北越之轟炸，如果巴第溫干預美國的軍事計劃，那是無充分證據的。

巴第溫為使紐約時報在美國成為強有力之報紙之一大記者。當他刊行一廣泛之調查，欲顯示美國軍

力因越戰而廣佈得太薄弱時，在五角大廈記者會中，除麥納瑪拉外，無人給予駁斥。但在幾天之內，洛杉磯時報揭發了一項祕密之國會議員之報告，表示四個國內陸軍師正作準備攻擊狀態，這一次五角大廈承認了，雖然麥納瑪拉堅持沒有什麼嚴重事態存在。

這種揭發的事在紐約時報並不是常常有的，可是不幸地大記者的職位被削弱了。時報的國外消息雖仍比其他美國報紙為多，但欄數減少了，然而時報仍能保持他的威望。雖然華盛頓郵報及洛杉磯時報國外服務之發展，在巴的摩爾、波士頓、聖路易、芝加哥及電視、新聞週刊記者不斷之努力中，紐約時報在此等競爭中仍佔優勢。並保有堅守信念的勇氣，這就是基本上為什麼時報能得到讀者崇敬之原因。

蘇茲柏格 (Arthur Hays Sulzberger) 是奧克斯 (Adolph S. Ochs) 的女婿，經常向他的編輯作忠告，引導時報的成長，他說：「記住，當你正出售一份報紙時，你是在出售一種習慣。」 (Remember, when you are selling a newspaper, you are selling a habit.)，意為時報提供讀者一種生活的習慣。

在美國大家常說高水準的報紙之銷數沒有一家能與時報相比，單就表面之價值而言那是正確的。但就高水準報紙之發展而言，那又全然是另一回事。現在時報之每一樣報導已不再是合於奧克斯當年所提「所有的消息都是值得刊載的」 (All the news that's fit to print) 之定義了。再者，面對漸來之競爭及漸高之耗費，廣告破壞了新聞的版面。在欄數方面，時報已不再是美國第一個新聞的媒介了。洛杉磯時報在一九六五年以四〇、三一六、四六八行的新聞及專欄居新聞報導之第一位，麥阿密前鋒報第二，有三三、四六六、七四三行。紐約時報有二七、一九四、一一四行，這種新聞的版面較之十年前為



少。

在每日所刊登之國外新聞的質的方面，時報仍宣稱爲全國之領導報紙，仍有其風格存在。但無疑地，這種標準已經降低。一九五三年國際新聞學會報告時報之每日平均國外新聞爲三二欄，此一比例，較十年前爲低，時報本身之記者爲首當注意者，亦爲常受抱怨者。

如同一般的美國報紙一樣，時報自韓戰結束至一九六〇年代早期對亞洲事務並未給予很大之注意。時報助理編輯Turner Catledge第一次旅行遠東時，決定適當擴充亞洲版面。任命兩名記者分駐日本及韓國，並設立東南亞之服務。派常駐記者在香港、西貢、吉隆坡，並派巡迴記者在雅加達、馬尼拉、台北、曼谷等地。並以香港爲採訪中國大陸之據點。Seymour Topping自一九六六年卽在香港擔任時報之國外編輯。

## 政府之問題

一九六一年當詹森總統訪問越南之前，當時他還是副總統，他對湄公河及各計劃很感興趣。一九六五年四月七日正當他在霍金斯(Johns Hopkins)演說之前，他草擬一項以一億元投資發展南越之計劃，包括湄公河谷，這是在四年前他所曾提過的，如今四年之後，美國之共同關注者仍爲美國對越南之承諾，並且認爲此一計劃爲對持久和平之最大希望。是以當今和平之追求，非僅以軍事爲後盾始可，必求實際之國際合作，創造各國有利之環境，從事經濟之援助與人才之交流與技術之合作，此爲人類追求和平之新途徑。

在促進國際間之了解方面，政府必須重視大眾傳播媒介，魯斯克國務卿曾說：「在民主社會中，報導新聞並注意政府之政策，皆為重要之政府的程序，若是沒有一個有能力的報業，整個社會的特性都將陷於危險之中。我們現在以至於將來都明白本身之責任，如何來改進消息傳遞之便捷，只要那是我們所可能做的。」

雖然政府在解釋政策方面有其困難，但是報紙除了少數之例外，皆能保持其傳統之精神，甚至在越戰之中，若以一種合作方式採取溫和的報導被認為是不大可能的。當出版物涉及軍事安全時，政府即加以檢查，實則最佳之方法為自我限制與實行自律。

## 報業與政府

美國在亞洲各新聞機構，許多記者及編輯們常以其獨立之報導自豪。所以使記者與政府之政策不能互相尊重與融洽，但也有些政府派駐各國之外交人員，他們仍能與記者相處的很好，甚至有一小部分記者的工作很受外交團的重視，他們從中得到有價值的消息及正確的分析。

儘管如此，在本質上政府與獨立報業在歷史的衝突中，未曾緩和。如同每位記者所熟知，外交人員對記者為何要把壞的消息揭發給公眾知道，冒一種失落支持之危險，幾乎常常有一種生來的懷疑。但也如同每一位外交人員所知道，記者常以各種複雜的動機來找尋一條新聞，特別是那些被禁止的新聞，而有些經常是不可信的。

這種政府官員與記者之間的競爭或敵對，艾奇遜（Dean Acheson）當他在一九五三年一月任國務

卿時，有個很好的說明。他說當時有位紐約時報的記者雷斯頓（James Reston）有次去看他，問以爲何他們之間（指政府官員與記者）不能處得很好，艾奇遜就說：「你的目的與我的目的到某種程度（To some extent）是相同的，因爲我們兩位所做的都是關乎公眾的消息與教育（public information and education），但在某些方面正相反，你們認爲新聞第一，所以預期一個新聞，報導那正在發生的，所以你們這方面的工作正是我們所頭痛的；舉例來說，如果我正滿懷信心要到國外去說服某一個他國官員，你就來發覺我的計劃，並且進一步報導我的計劃，但這可能就破壞了我的目的，所以你的工作宜細察，而我的工作須保密。」

不論報紙本身是否自加約束，編輯們認爲這種約束並無需要。因爲任何美國政府的舉動，幾乎不可能保持一種長久的祕密，如果報業在這個時代裏，有著更大的國際責任的話，那麼美國的總統與國務卿仍參與於外交政策的廣泛領域中。他們應該多做些事，除了擬定政策之外，更須在行政與立法兩個部門中尋求一致的意見（consensus），對他的意見予以支持，他們亦須將其政策公諸於國內或國外，甚至敵方跟友方輿論的市場中。

從一個非常真實的意義上來省，這一個過程代表一種所謂公眾外交（public diplomacy）的成長。我們遠溯到一九一八年巴黎和會以後，各民主國家對於外交問題之處理方式，完全改變，外交政策的擬訂，在第一次大戰前，係由少數人決定，一般民衆絕對不能參加任何意見。但戰後之各國政府對於外交政策，已不再信賴少數職業外交家，轉而向一般民衆請教，故戰後各民主國家之民衆，對於國家政策均有追問之權，但如何使民衆能澈底了解外交問題，及如何使大眾之意見形成具體外交政策，政府如何

了解與所擬訂之政策有關之經濟、社會及教育各方面之問題，如何將問題真象正確的傳達於民衆，在外交政策「民主化」的社會中，傳播事業提供了不少的貢獻。

### 在亞洲之美國國外記者

一九六五年夏秋天，數百位美國新聞機構的記者，在亞洲辛勤的工作，他們採訪了一場甚具強度之越戰，印度、巴基斯坦間爲喀什米爾之三週戰爭，印尼政權的垮台，新加坡之離開馬來西亞，以及匪、俄邊界衝突事件。其間日本及菲律賓是主要的傳播中心，其次是台灣、泰國、緬甸及其他地區。

雖然許多不利的因素，但在某一意義上，似乎可以這麼說，亞洲主要國家跟美國間新聞的流通性比二次大戰來任何時期都大，自從韓戰以來，國外記者亦比以前多了，美國公衆對亞洲事務亦有著較好的瞭解，然而新聞的交換，國外記者的工作，及美國人對亞洲事務了解的程度與吾人之希望仍相去甚遠。

通訊社服務仍是居佼佼者之地位，AP及UPI供給美國的報紙及廣播界大量有關亞洲的消息。並且與路透社、法新社、德通社、日本共同社相競爭，他們亦將美國及世界的大量消息帶到亞洲。在報紙方面，紐約時報在亞洲仍有最多的記者，並且做了最感人的報導，華盛頓郵報、洛杉磯時報聯合進行採訪，老芝加哥每日新聞資料社亦努力改進他有限的資料，其他巴的摩爾太陽報、基督教科學箴言報、華爾街新聞皆對某些特定地區作深度之採訪報導。另有新設立之克布萊新聞社（Copley News Service）亦建立起基礎來。在雜誌方面，週刊以“Time”“Life”居頭導地位。Newswehe亦甚傑出。「美國新聞及世界報導」（U S News and World Report）以少數之記者而能對發生之事情（events）供給有意義。

充分之了解。Mcgraw-Hill及Fairchild對亞洲之商業及金融作了特殊的採訪。

在電視方面，電視之戰地記者採訪了第一手的新聞。

駐在亞洲之記者，一則他們必須有經驗，再者必須有經濟充裕之新聞機關為之支持。如同紐約時報、華盛頓郵報、洛杉磯時報、巴的摩爾太陽報及基督教科學箴言報在與國外競爭之比較中皆獲殊榮。那些訂購美國最好的新聞資料社的報紙有自信將亞洲的事務提供較完全之報導。一般說來，駐在亞洲的記者仍未能像駐在歐洲的記者那般接近於專家。駐在歐洲、倫敦、華盛頓的記者通常比較受重視，理由當然很多，有的因為他們較知名，有些因為他們在同一城市服務得比較久。英國及歐洲國家對亞洲事務興趣的低落主要是因為他在亞洲的殖民地消失了。然而路透社、法新社及美國的電報將大部份亞洲的消息傳到英國及歐洲。一些（少數）英國出版物，像倫敦每日電訊報、時報、衛報及觀察人報、快報亦正努力在亞洲的主要城市採訪。在巴黎的世界報及費加羅報亦是。

作者曾利用訪問亞洲之旅行，作了一次問卷訪答，其中包括九十一位美國各大新聞機構派駐在亞洲的記者，包括七十五位美國人，日本、韓國各三位。菲律賓、印度各兩位，英國、紐西蘭、澳洲、法國、黎巴嫩、中國各一位，平均年齡為三八·五歲。在亞洲服務的平均期間有二〇·三個月。代表美國十五個報紙或報團，三個週刊，二個商業新聞機構。三個廣告網，二個廣播服務社。

茲誌其大致情形如下：

Media Representation in Survey (U. S. Correspondents In Asia)

Post	newspapers	radio TV	magazines	wire service
Tokyo	8	3	10	13
Seoul	1			2
Honk Kong	5	3	6	2
Saigon	3	4	4	4
Manila	2			3
Kuala Lumpur, Djakarta, Vientian	1			6
New Delhi, Karachi	6		3	3
	25	10	23	33

在受測之九十一名中，除了九名之外，不僅通曉英文，亦通曉第二種外國語，而以法語居多。很少人能熟練日文、中文、俄文尤其是印度語。在記者中，具有語言天才者皆能勝任較繁重之工作，可是這種語言訓練，只有以政府之財力方可予以支持。

這九十一位記者，大部份都表示對工作很滿意，因為他們都得到美國大使館的幫助。九十一人中，七十人認為在亞洲地區一般說來新聞的獲得並不困難，但有十九位認為相當困難，尤其是在南越、印尼、巴基斯坦、緬甸，一位記者這麼說：「在亞洲，不包含於政府的公告中的真正新聞 (substantive news) 經常難予取得。」

在分析記者採訪消息來源 (source) 的障礙因素中，九十一人中認為語言障礙者占二十二名，懷

疑與不信者占十七人，當地之不同習慣者七人，地理因素者四人，傳播之困難者四人，其他十三人，十位沒回答，十四位回答沒障礙，其中有一位指責美國大使館對他封鎖新聞來源。

在分析新聞報導之類別方面，政治類二十四人，軍事十八人，中共十七人，冷戰七人，商業金融十八人，由以上之統計，美國之國外記者在洲亞以報導政治事務（Political Affairs），越戰及中共之新聞最多。

在九十一位記者中，最為有名的，據作者問卷之分析計有芝加哥每日新聞報之比琪（Keyes Beech），美國新聞與世界報導之馬丁（Robert P. Martin）及美聯社之羅得立克（John Roderick）較次之者有華盛頓郵報駐印度之哈里遜（Selig Harrison），倫敦觀察人報在東南亞之布拉偉斯（Dennis Bloodworth）紐約時報駐中國記者寶丁（Tillman Durdin），時代雜誌駐中國之費斯勒（Loren Fessler），華盛頓郵報駐東南亞之卡諾（Stan Karnow），美國新聞與世界報導駐印度之山德士（Sol Sanders）及駐日本之連多非（John Ranaolph）等等。

駐在亞洲之美國記者對亞洲事務及亞洲人之態度亦常有其不同之觀點。他們將報導之中心集中於亞洲大陸在戰爭及政治方面之傾向。

## 國外新聞之刊登

一九六四年夏天，緊張局勢佈滿整個亞洲，東南亞地區越南與寮國之戰事已達嚴重之程度。菲律賓嘗試圖調停印尼及馬來西亞間的爭執而未果，在一個高階層會議失敗之後，印尼民兵突擊隊開始沿馬來

西亞沿岸登陸。美國正派遣艦隊赴泰國。印度遭到嚴重的糧食匱乏，巴基斯坦與喀什米爾的敵對復起，而中共軍隊從喜馬拉雅山間向印度進行威脅，亦向韓國推進，和平面臨危險，亞洲人民只有拭目以待美國之作爲了。

在這段期間取自一九六四年六月十五—廿一日，七月十三日至十九日，八月十七—廿三日之研究分析，紐約時報在它每天十八點三欄之國外新聞中平均以四、二欄報導亞洲之事務；洛杉磯時報在同樣之三週期間，在平均每天九、四欄之國外新聞中，亞洲之報導佔三、三欄；基督教科學箴言報在一〇、一欄中亞洲報導佔二欄，路易士郵訊報三、七欄中佔一、三欄，芝加哥每日新聞報在三、八欄中佔〇、九五欄，黃城詢問人報在三、五欄中佔〇、九欄。

以上之統計，若以百分之比表示。如下表：

Asian News In Selected U. S. Newspapers

Newspaper	Per cent foreign news	Per cent Asian News	from own correspondents
New York Times	22	20	85
Los Angeles Times	15	35	47
Washington Post	12	25	31
Philadelphia Inquirer	8	26	2
St. Louis Post-Dispatch	9	34	8
Chicago Daily News	10	25	55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37	19	77



表中，除指出國外新聞及亞洲事業報導之百分比外，亦指出各報之國外記者供給各報之百分比，其中紐約時報有百分之八十五之消息來自本報之記者，基督教科學箴言報百分之七十七，芝加哥每日新聞百分之五十五，洛杉磯時報百分之四十七，華盛頓郵報百分之卅一，聖路易郵訊報及費城觀察人報無本身固定之記者，主要靠美聯社，國際合眾社、路透社及其他國外新聞社供給稿源。

洛杉磯時報近年來以其嶄新之後起者從事於報導國外新聞之努力，華盛頓郵報亦與洛杉磯時報合作，改進其國外服務。基督教科學箴言報之改進尤可稱讚。

當然，沒有一直接之比較可為說明美國與亞洲國家之間新聞報導之份量。但可就一般之研究作成統計如下表：

News In Selected Japanese Newspapers

Newspapers	per cent		percentages of the foreign news			from own correspondents
	foreign news	U. S. Asia	Europe	others		
Asahi Shimbun	26	37	26	30	7	60
Mainichi Shimbun	17	21	25	46	8	71
Yomiuri Shimbun	11	19	34	39	8	65
Japan Times	46	34	32	25	9	6

上表，若以欄數計算，朝日新聞在每日二一、六欄之新聞報導中，有五、六欄報導國外新聞，而以兩欄報導有關美國之新聞。每日新聞在平均每日二五、四欄之新聞報導中，有四、三欄之國外新聞，其中美國佔〇·九五欄，讀賣新聞在二四·二欄中，國外新聞佔二·九欄，其中美國之新聞佔〇·六欄。

如同美國之主要報紙一樣，日本報紙之國外新聞大部份來自各該報駐外記者之採訪，朝日有百分之六十之新聞來自本身之記者，百分之十一來自美聯社，每日新聞之比例更高，有百分之七十一來自本報之記者，百分之十一來自國際合眾社，讀賣新聞有百分之六十五之新聞來自本報之記者，百分之十八來自美聯社。

東南亞之報紙，在美國或歐洲很少有它本身之記者，大部分之消息皆仰賴於美聯社供給大部分美國之消息，其次為國際合眾社，紐約時報，國外新聞社及其他資料社。

除了菲律賓外，在香港，馬尼拉報紙之領導人可分為英國系統或美國系統，在香港之南華早報及吉隆坡之海峽時報，以採用路透社之消息為多。香港虎報較傾向於美聯社及國際合眾社及美國之漫畫，香港虎報之國外新聞佔百分之四十四，其中美國新聞佔百分之廿。在亞洲之報紙中，刊登美國消息最多者為菲律賓前鋒報，在他百分之廿四·四之國外新聞中，美國之新聞佔百分之四十六。

在印度，經由一些印度國外記者及路透社在美國之觀察得以了解美國，在有些報紙，美聯社在印度被採用的機會很少，但這並不意味印度的報紙對美國之事情懷不友善之解釋。在一九六四年，大部分之記者對美國都是非常友善的，在華盛頓，甚至法新社的記者一般都非常不願意寫那屬於極端之稿子。

印度的報紙，從調查所得之記錄，給予其讀者更廣泛之世界觀點，舉例來說，印度快報在平均每日三一·五欄之新聞中，國外新聞佔五·七欄，其中有關美國者佔一·二欄。印度時報在每日平均三二·六欄之新聞中，國外新聞佔六·七欄，其中美國佔一·三欄，茲誌東南亞報紙刊登美國新聞之比例如下

U. S. news In Selected Southeast Asia Newspapers

Newspaper	per cent foreign news	per cent U. S. news	from own correspondents
Manila Times	17.2	32.4	23.2
Philippines Herald	24.4	46	15
Manila Chronicle	22.5	40.8	9.6
Straits Times	23.2	22.2	18
Hong Kong Tiger Standard	44	20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38	13	5.9

因此，從日本以至於印度，報紙之個別的國外記者可將美國之政策作詳盡之解釋，可是他們的報導刊登的版面仍嫌少些，但他的影響力却仍相當之大。新聞雜誌與評論無疑可給予國外事務有意義之充分解釋，但很少人願意去做，至於電視，它在潛力上具有最大之影響力，它似乎未盡其全力。

### 越戰中美國大使館的任務

一九六四年夏天，當總統競選活動達於高潮之際，美國在越南戰爭之重新估價遍及全美人民。如同國際合衆社九月十日來自華盛頓之報告稱：「美國駐越南大使泰勒經報告，雖則最近政治之混亂，但反抗共黨之戰爭已有繼續之進展。總統說泰勒給予國會領導人以完全（充分）而坦白之現勢分析……」。

新聞週刊在它的說明中，指出泰勒將軍顯示出樂觀的態度，雖然駐西貢之美國記者絲毫未予證實，這就是越戰中美國政府與報界相對立之一典型的例子。

六天之後，在泰勒大使於華盛頓表示歡愉之際，另外一個政府的騷擾在西貢發生了。紐約時報一掃樂觀主義之論調，予以駁斥說：「在不到一年以前，高級官員宣稱反越共之戰爭可於一九六五年贏得勝利，如今此一幻覺低落，甚至上週政府向人民所宣布之消息未免太樂觀了。美國的士兵在南越每天都有傷亡，美國人該知所有之事實，僅管是如何的冷酷。……」

泰勒將軍經協助設計美國在越南之戰略，是最近的一位傑出的政治家，外交家及士兵，他被整天高唱勝利，而實際則為陰沈之失敗之分歧的國家政策所遺棄。早在一九六二年冬天，甘迺迪的弟弟Attorney General Robert F. Kennedy 在他旅行西貢期間發現戰爭並非完全處於劣勢（就美國之方面而言），向他的哥哥保證在越南贏取戰爭的決心。Frederik E. Nolting Jr. 當時他被任命擔任美國駐西貢大使試圖平穩吳廷琰之危機，直至一九六三年八月十五他去職，他不相信任何事都是糟透的，越南人正從事贏取戰爭的計劃。

當年十一月，吳廷琰政權被推翻之後，不流血之妙計致使阮高奇於一九六四年元月三十日取得政權。美國國務卿魯斯克在西貢宣稱此為「穩定進步」之情勢，國防部長麥納瑪拉，在他經常性之巡視期間，是樂觀主義者中最具決定性者。甚至洛奇在他一九六四年六月二十九日任美國駐西貢大使首次出巡後向詹森總統提出一個鼓舞之報告。

但是樂觀主義者並不足以來信服報界。在西貢之記者正報導者此一時期不斷的政府的混亂及挫敗。

因此，詹森政府在一九六四年六月一日在檀島會議中決定以美國新聞處作爲一高級機構看看戰爭是否經適合地報導給美國人民。此爲一最初目的之延伸，經由影響其他國家之態度，及勸告美國之總統，以完成美國外交政策之目標。」

但是檀島會議決不認爲國外報紙就是美國報業代表越南戰爭之方法。魯斯克國務卿、麥納瑪拉及泰勒大使等皆以爲政府的新聞政策當有一有意義之改變。經有許多年，在許多美國大使館中，美國新聞處之人員掌握那些尋找索（Guidance）之美國或非美國之新聞記者已被認爲是一種例行的事。誠然，那些常在西貢美國新聞處走動的記者得到更多的線索。

如今經決定更多具活力之節目應經由美國新聞處來確信美國努力之真實故事得以在美國及其他各地加以報導。爲此目標，與會者咸認此一深受矚望之目標，可以在美國大使館之指導下，安排一政府官員來處理有關在南越政治、經濟、軍事方面來自美國之消息而達成之，此一官員亦有責任檢查某些記者新聞之可靠性，而他必須有一種主動之消息所供應。當時曾指令佐斯安（Barry Zorthian）新聞專家擔當此一工作，他時年四十四，當他出生時，他的雙親帶他到土耳其，當他三歲時，到康奈州。在耶魯讀大學時，他主修國際關係。一九四一年，他畢業了，曾做過Vermont週報之編輯，二次大戰期間在美國海軍任職。之後，他成功地作爲一位New Heaven Register的記者，以及哥倫比亞廣播公司的新聞編輯。一九四七年他加入紐約美國之音。當他當美國之音節目主持人時，他利用夜晚到紐約大學學習法律。一九五二年他以優等成績得到法學碩士。十年之後，他爲世界各地之美國新聞處而工作，直至他到新德里，在那兒，他任美國新聞處駐印度之副主任，一九六四年初，他到西貢。

當他後來擔任聯合美國公共事務處（The Joint U. S. Public Affairs Office）主任時，佐斯安開始以他的職員來照管內部，外部的節目。在兩年之內，他有了一百多名有經驗的政府新聞官員，以及其他在西貢中心守衛總部工作的人員，同時還有許多軍事新聞專家。他工作的主要目標是引導越南人民使具承擔偉大責任之信心。

Air-Force-Space Digest Magazine）高級編輯威特茲（Claude Witze）訪問西貢對於佐斯安在始初運動成立政府新聞中心時作如下之評論：

「知認份子不誠實之沮喪事經在一九六〇年代之西貢可見一斑，其是否能有所改進殊堪懷疑，官員們正給予訓令，使單一之人來處理西貢之報業，他的工作在於更正來自西貢之所謂錯誤之消息。而所謂錯誤之消息乃指對南越人民之貢獻及其奮戰意願之批評。同樣之報告指向忽視越共恐怖份子，背叛者及流落者，……」

佐斯安試圖以一些新的途徑來獲取反叛報紙的注意，以高級官員舉行簡報會，使他們更爲接近大使，與美國的指揮官同旅行如魏摩蘭將軍等等。

但是，立即地，魏摩蘭將軍的信心被一位記者（輕易）的宣佈所破壞，這使魏摩蘭將軍欲參與一使消息更爲有用之節目因而受挫。

在一個場合裏，他問起一位攝影記者，爲什麼他拍了這麼多南越人民殘酷的相片，這些照片並流傳到世界之報紙，但有許多越共兇暴的相片却拿不到手，這位攝影師大吃一驚。他說：「你認爲這些照片不好嗎？你該再看看一些我沒選用的照片呢！」

在另外一個場合，一位記者報導泰勒大使與阮高奇將軍曾有過有激烈之爭辯時，大使館經由佐斯安辦公室正式予以否認。泰勒大使在一個美國電視節目中說明他與阮高奇之良好關係。但不久之後，這位記者證實這個報導是完全確實的。

當第一位記者在一九六四年夏天自南越陸軍到來時，曾捕有北越滲入十七度線以南之北越軍隊，但曾有喧囂之美國人的反對。儘管如此，有兩位美國記者得南越之允許訪問受監禁的人，因而事實的真相因以確立。便使美國人感到驚奇的是美國當局再度堅持沒有北越人民在南越活動。結果，泰勒大使私下承認南越確捕有北越士兵，但強調那僅只三名而已。一年之後，美國當局相信有一萬名北越軍隊在十七度線以南活動。

某些政府官員使用一種最受人譴責之方法之一為勸阻記者們不要報導壞消息，並警告說那將引起更大之戰爭，可能與中共為戰。根據這種特殊哲學後面的推理乃是美國在南越之戰爭所受的批評正給予美國之敵人以鼓勵作用。除此之外，它亦向敵人表示美國的公衆並不十分支持美國政府。結論乃是此一不斷之批評可能導致河內與北平雙方皆陷於危險之錯誤估計之中。

當一九六四年戰爭進行得並不理想的時候，在西貢之南越之權力爭奪造成一種幾乎近於無政府之狀態。九月，阮高奇將軍想出一個妙計，於十月步上首相之席，但所造成之混亂較前尤甚。在像謎般的和尚的領袖領導下，這些和尚曾協助推翻吳廷琰政權，到後來這些和尚被鑑定為共產黨。

美駐越大使曾引用說越南領袖是反美之將軍團的中心，他們對越共之作戰並未盡全力，此一戰爭某些官員之常抱樂觀是難以證實的。

## 台灣之呼聲

台灣得以在島外之疆界得到最佳之防衛，以爲美國軍事之一定理。艾森豪總統在一九五四年八月十七日一次記者會中曾說：「任何對台灣之進犯必須先壓服美國的第七艦隊。」

在政治上亦復如此，防衛中華民國，影響美國使之嘉惠於中國之地方是在華盛頓而非在台灣，此亦爲公認之事理者也。一九六〇年尼克森、甘迺迪競選美國總統，曾熱烈爭辯外島金門、馬祖之防衛與否問題，然此皆非 蔣總統所曾考慮之問題。

在密西根大學的一項調查研究中，在一五〇一個美國人中有百分之七十二知道中國大陸爲共產黨所控制，其中有百分之四十想不起中華民國之領導者或其位置。報告中又指出，如果我們假定所有那些不知道中共政府的存在，也不知道有中華民國政府者，那麼只有百分之四十三的人可將之分類爲知道中華民國者。

在所有美國新聞機構中，只有美聯社有願駐台灣之記者，名爲模沙（Spencer Moosa）。他在一九四九年隨 蔣總統自成都取道香港至台，沒有那位記者了解 蔣介石先生比模沙更多者。模沙當記者的歷史與他在中國的生涯相同。他於一九〇五年生於上海，一九二六年起，他担任路透社駐上海之副編輯，之後任總編輯。一九三九年加入美聯社，他跟隨著各地的戰事，一九四一至一九四六他以重慶爲基地。

當日本投降時，模沙回到上海，在中國北方任記者直至 蔣總統政府至台灣。從此之後，他在台北



，是個很熟悉的人物——高個子，嚴肅的外表，沉默寡言，經常出現於中國之重要集會中。沒有那一位美聯社的記者留在此一亞洲偏僻之地如此之久。

與美聯社相競爭之合衆國際社亦有一系列之記者，他們大部分是年青者，渴望獲取經驗，其中之一爲蓋勒（Ken Gale）他在台北工作兩年直至一九六四年始離去，時年二十七歲，他做了哥倫比亞大學國際報導的福特會員（Ford Fellow in International Reporting at Columbia University）在一種一切相當佔優勢之情況下，美國人在台灣當記者前途並不大，對本地之中國人亦復如此。

美聯社以一種溫和之結論報告世界新聞檢查之概況說：「新聞檢查在中華民國之稿件或新聞並未應用，但是報紙遵守着某些禁忌，如報紙避免批評反攻大陸之最高國策。中華民國因被認爲缺乏新聞自由而被摒於國際新聞學會之外。」（按一九六九年，UPI已認可中華民國入會）

新聞局長沈劍虹稱台灣的報業雖有出版法的限制，但它是自由的。在出版法之主要條文中，如三十二條：出版品不得爲左列各款之記載：（一）觸犯或煽動他人觸犯內亂罪外患罪者。（二）觸犯或煽動他人觸犯妨害公務罪，妨害投票罪，或妨害秩序罪者。（三）觸犯或煽動他人觸犯褻瀆祀典罪，或妨害風化罪者。

近來台灣之進步頗足稱道，經過多年美國之援助，台灣已經能夠自給自足，工業產品自一九五一年來增爲百分之三百，農業之生產由於成功的土地改革的結果，增加了百分之七十，出口幾達三倍，入口幾達二倍，工廠數自一萬增至二萬五千，而得免於國外之援助。

在台灣大眾傳播網足夠一千一百萬人口享用，其中識字率爲百分之七十。有二百萬人熱衷於讀報，

九百萬台灣人收聽本地語言之節目。台灣之土地與美國之馬里蘭州及德拉威州兩州一般大，長二百四十哩，寬六十至九十哩，國家之安全列為第一要務，對共黨之陰謀時時予以警惕。

台灣有三十一家日報，每日之銷數為七十二萬份，平均每一百人有六、五份。有十九家報紙在台北，最主要者為中央日報、中華日報皆為國民黨所有，為政府發表言論，最有名之民營報紙為聯合報，銷數最大。皆接受中央社之供稿。中央社並與全球之通訊社訂有交換稿件之協定。

接受美國訓練之新聞從業員在政府及報業中佔特殊之地位。其中尤以畢業於密蘇里及哥倫比亞新聞學院者居多。部分畢業於戰時之重慶及新聞研究所。他們在外交部、新聞局、報社、和駐在海外之主要地方為政府而工作。

其中最值一提者為余夢燕女士，他自力經營中國郵報並且採用最新凸版印刷。

在台灣，除了美國之音及美軍電台之外，尚有一百五十六個電台，其中最要者為中國廣播公司，並由對大陸同胞廣播，作為宣傳之用。

談到中華民國在土地改革及農業方面的成就，它不僅有利於台灣人民之生活，且以其技術援助非洲剛興起之國家，而獲得這些國家之好感。

## 面臨之未來

美國在亞洲之承諾正擴大中，展望未來，如果美國祇圖其國內大社會之進展而不顧其他一切的話，似乎是不可能的。除了國家自殺之舉動外，美國不可能從他保證保護亞洲及東南亞地區撤退其責任。新

孤立主義的幻想將不會改變此一事實。

如果美國的外交政策是有效的，那麼政府必須首先做的一件事就是恢復他在亞洲的信心。僅只那些在越南作戰的美國人之勇敢與自我犧牲是不够的，雖然他們是很可讚佩的，美國政府在這一塊奇異的土地上，不能以獲得一些短暫的進展爲己足，它更當使他的作爲有所收獲。它不能使自己的威信受到破壞。

當今，美國之弱點始自艾森豪時代之CIN事件，繼之以甘迺迪時代之豬羅灣災禍，以至於推翻吳廷琰政府之前之南越問題而達其高峯。此等事件負責之官員不論在國內和國外皆未能忠實或立即地予以妥善的處理。

此等舉措不僅危害國家最重要之消息來源之政府，並且危害以信心尋求報導一國事務之可信性。今天，附之於正式政府公告之疑惑的因素比過去任何時代爲大。維繫美國政府與美國人民之信任已經被削弱。

的確，政府也不是全然可爲譴責的，在有些國家，大衆媒介之作爲亦有些疏於職責之因素。雖然美國報紙之專致於報導地方消息，提高銷數及更多之廣告合同，而增加國外事務之報導乃爲當務之急，亞洲務之報導應有其適當之份量。

電視之責任亦具有同樣重要之角色，僅只一些主要之報紙，通訊社，新聞雜誌與評論以及電視評論殊不足以擔當二十五年來致使美軍在亞洲增爲三倍之亞洲的問題。星期雜誌對亞洲事務之描述較無困難，他們的國外採訪有益於國際版之充實，可是電視之收入確可使它去完成更多的責任。

在亞洲與美國兩個世界最大之單一目標厥爲和平之追求。然而，今日此一遠景仍甚遙遠。因爲如此，所以亞洲之紛亂深深影響到世界之其他國家。美國試圖從中做其領導。當今，混亂不安之中心在東南亞，接着可能就是印度，再往下就是中共（中國大陸）。隨着二次大戰之後，橫掃亞洲大陸之革命風暴在本世界將不會自己熄滅，也很可能繼續存在下去。

大衆媒介在此等國家努力中之任務，在一百廿五年，Alexis de Tocqueville 曾依據報紙在民主社會中之責任作如下之說明：

「當人們不再以堅定及持久之結合團結在一起的時候，除非你能說服每一個人使他個人之利益能自願地以其努力與他人相結合的話，那是很難得到廣大羣衆的合作，此一過程惟藉報紙乃能達成。報紙能將同一思想於同一時刻廣達於千萬人心中，報紙實爲一最佳的顧問。」

「報紙不僅是具有保護自由之作用，它更維持文化，我並不否認，在民主之社會中，報紙經常引導人們一起成爲不良消化之狀況，但是假如沒有報紙，也就沒有所謂共同之活動。報紙所產生之罪惡遠比他所嘉惠者爲少。」

編輯若僅以刊登選自通訊社，國外新聞資料社或其本身之記者之亞洲新聞爲已足，那是無價值的，事如果公衆並不讀它，或者對複雜之國外問題接受之比率很低，那麼這種努力及其版面皆屬枉費。

因此，當今所最感迫切需要者爲培養更多的傳播者——記者、評論者、編輯、教師、公民領袖、政府官員等等對亞洲事務有着更佳了解之人員，在必須之公衆教育的領域中，民主之政府與獨立之報業二者並無衝突，因爲二者告知（inform）公衆的責任相同，儘管他們所關注者並不盡相同。

再者，首先當爲克服之困難爲可資應用之傳播中心的缺少。所以廣爲設置新聞傳遞機構，充實設備與經費迨爲促進兩個世界間瞭解隔閡之捷徑。

有些報紙本身經已從事於教育之節目。Minneapolis Star's Weekly Background Studies 廣泛流傳於中東。堪薩斯城星報及費城詢問人報也作出了廣泛之教育計劃。而基督教科學箴言報出刊地圖集，深得大眾的贊賞。

在激發公眾之興趣之進一步努力中，政府利用電視安排政府官員發表談話，作爲一種政策之宣布，但除了總統之談話外，這種方式並不能吸引廣大的羣衆，但是和從越南回來之年青人員談談他們的見聞及經驗倒是很受歡迎的，國外之記者亦然，這種方法倒可多用以吸引觀衆對亞洲事務之特別興趣。

美國及亞洲國家間新聞記者，教師及其他傳播者交換計劃之增加是教育過程之另一主要部分。亞洲新聞閱讀觀衆之擴大有賴於在亞洲對美國問題感興趣之政府機構及基金會之活動。

很明顯的，在亞洲主要城市駐守優良之記者將激發公眾尋求及接受更多消息的意願。電視之任務是不難了解的，但是第一流的電視記者及評論者非常之少，所作之工作有時亦甚草率。所以較多且訓練較好之電子傳播人員是非常需要的。此外，雜誌社之記者亦甚爲需要。

無疑地，亞洲報紙由於一地區變革之壓力，所以所受之限制亦較大。但是不管這種實際上之困難，努力於報業自由之爭取仍屬必要。

成立報業研究會 (Press Institutes) 如同在印度、菲律賓、伊朗所成立者，對訓練良好的新聞記者甚有助益。在美國之大學爲國外之新聞從業員作研究計劃亦有幫助。應用國際新聞學會及其他機構之

助予亞洲之大眾媒介。

以前，普立茲曾寫道：「我們的國家家及其報紙將同起落、同興衰，一個廉能具公共精神之存公眾之美德。沒有了它，大眾的政府將是虛偽的。一個腐敗的報紙也會使人民腐敗。所以的未來模式將落在未來新聞從業人員的手中。」

茲所認為共和國之觀念在亞洲尚屬遙遠，很少人了解它，也很少人相信它，此惟賴傳播事業溝通了解。是以在亞洲地方多設置新聞中心，多多提供政府的各項設施、政策、激發公眾對興趣，交換研究成果，多多訓練新聞從業員，尤其是廣播電視記者，以促進兩個世界間之瞭